

数字时代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传播路径研究

■ 李言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扎根历程本质上是基于我国社会矛盾不断变化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结合时代背景不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和发展

一、数字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数字时代下，无论是信息传播还是生产力的进步速度都是难以想象的，但同时也会存在着意识形态多元化、地区发展鸿沟、数字技术的伦理问题等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传播造成障碍。

（一）多元意识形态的冲击

信息爆炸和信息污染容易造成传受失衡和信息疾病。网络信息容量的猛增也导致了信息爆炸和信息污染。在社会层面，依托互联网平台，信息传播的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广使得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思潮和价值观，如享乐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断涌入人们的视野之中，对民众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给社会的和谐以及意识形态的稳定造成威胁。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错误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取向将会误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严重削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20 世纪末的历史虚无主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思潮便对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方向和意识形态领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导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指导地位被颠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到冲击，苏联的政治制

度和国家体制也因此受到严重破坏，最终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二）区域间的数字鸿沟现象

人类今天正在经历着第四次科技革命，数字技术便是本次革命的产物和标志，是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结合作为其产生的基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其向各行业的扩散，已形成数字化浪潮，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矛盾不断发生新的变化，衍生出新兴产业形态。虽然我国正在大力发展数字技术，但在不同城市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数字技术的发展并不均衡，存在着明显的数字鸿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数字技术发展落后地区的传播和应用，对推进马克思主义“飞入寻常百姓家”形成阻碍。目前，在我国大多数乡村中，由于生产力基础相对薄弱、技术投入资金短缺、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等原因，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数字技术开发层次和应用水平相对较低，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传播和实践互动中较为滞后，媒体资源相对匮乏，广播、电视等媒体仍是村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传播形式较为单一且非形象化。因此，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意义上具有难度，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传播和发展。

（三）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可能衍生新的异化形式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雇佣劳动的发展，出现了劳动异化现象，人逐渐地丧失了主体性地位，马克思和卢卡奇也曾分别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视角阐发了“物化

批判”。当现代社会发展到数字技术时代，衍生出了一种异化的新形态——数字异化。数字异化是指在数字技术、AI 技术等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各个领域过程中，数字技术出现脱离人的控制，并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的现象，使人处于被动的、依赖的地位。在认知方面，网络平台和数字设备已经成为主体获取搜索信息的主要来源，大量碎片化的信息影响人们进行体系化、系统化的思考。长此以往会导致人们更习惯于被动地接收，注意力难以集中，思考只停留在表层，缺乏创新能力。在人的社会关系上，数字异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人与人关系的疏离，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在数字时代，人与人更多地将时间花在虚拟社交上，淡化了人们的真实情感交流和情感的健康发展。

二、“数字+”赋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传播路径建构

（一）“数字+文化”

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意识形态入侵危机下，文化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力量，同数字技术的结合可以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传播的效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传播提供新的思路和机遇。文化植根于人的类本质实践活动，在本质上是“以人文”和“以文化人”的有机统一，人类在“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中华文化拥有五千年之久的悠长历史和丰富的理论内蕴，同马克思主义不乏内在的契合性。因此，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中国

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能够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还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具亲和力。在二者联结的过程中，数字技术将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充当中介和桥梁的作用。在人民群众熟知的传统故事、谚语等内容形式中挖掘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群众观点等，借助数字媒体渠道进行推广，通过多种通俗化、接地气的方式，让马克思主义理论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理解水平和实践需求，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学习、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指导实践和丰富精神世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二）“数字+理论”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从学科视角看，我国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更多倾向于从某单一视角而不是整体性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受苏联影响，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构成，因此在中国也习惯将马克思主义分拆为对应的三大学科进行研究。进入 21 世纪，人们已经意识到如此分门别类的研究的局限与弊端，但如何从整体上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仍然处于思考和尝试的阶段，成果并不是很多。但在数字时代，网络可以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作出巨大贡献。首先，借助文献整理和分析软件，快速对国内已有研究文献进行回溯、分类、整理，再进行具体的归纳总结，找出不同时代研究热点的变迁和薄弱环节等。这样不仅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可以将大多数文献纳入分析菜单里，避免人工整理容易产生遗漏问题。其次，使用数字软件可以分析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学习借鉴之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断创新，最后，数字网络进一步打破了研究成果推广的壁垒，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可以不用跨越空间、线上进行学术交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推动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实现新的飞跃。

（三）“数字+传播”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手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网络的普及使得信息能够突破时空限制迅速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可以通过官方网站、社交媒体平台等多种网络渠道广泛发布。目前，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在网络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专题网页，这些网页整合了丰富的文献资料、研究成果和在线课程，方便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群学习。大数据技术则能精准分析受众的需求和偏好，根据这些数据，传播者可以有针对性地推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内容，提高传播效率。对于青年传播，推送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解读，如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就业观、消费观等。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开发智能学习助手，通过语音交互、智能问答等形式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一方面，借助大数据能精准分析不同受众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接受程度和理解偏差。通过分析网络搜索数据、社交媒体讨论热点等，了解大众关注焦点，从而有针对性地推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容，提高民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度和了解度。另一方面，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等数字技术，可以打造沉浸式体验场域，提高民众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作用，增强理论的感受力。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习近平青年成长成才重要论述研究

■ 朱晓丽

习近平指出：“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青年成长成才问题不仅关乎青年的人生幸福，也事关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密切关注青年成长，多次与青年座谈往来书信，就关乎青年成长的关键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形成了系统全面、科学严谨、凝练生动的青年成长成才内容体系，为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提供了方向指引与方法指导。

一、树立远大理想，坚定理想信念

“理想指引人生方向，坚定理想决定事业成败。”青年人树立远大理想抱负与坚定理想信念，对于青年自身与国家民族的命运都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青年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只有树立理想抱负的青年，才能在纷繁的物质诱惑下保持定力，沉潜学习，不浪费青春时光；才能在多元的文化侵袭中保持清醒，分辨是非，不走错人生道路。广大青年只有投身伟大事业，不懈奋斗，最终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实现人生价值。另一方面，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正需要广大青年为之奋斗，使近百年来党和人民的愿望成为现实。

引导广大青年树立远大理想抱负离不开常态化的理想信念教育。一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年。要引导青年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掌握强大思想武器，认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二要坚持开展“四史”教育。要引导青年增强历史认知，培育爱党爱国情感；引导青年把握历史规律，联系历史来分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党的历史方位与使命；引导青年感悟历史精神，在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过程中净化心灵、滋养精神；引导青年形成正确历史观，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开拓奋进的姿态走向社会主义光明未来。三要坚持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要引导青年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使中国青年树立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胜信心。

二、锤炼品德修为，培养高尚人格

“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青年的成长成才离不开高尚的道德品质。同时，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习近平高度重视青年的道德品格问题，认为青年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养成十分重要”。

高尚品格的培养与品德修为的锤炼需要广大青年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一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既要明大德、厚情怀，又要修私德、管小节；既要在开阔眼界的基础上树立科学理想抱负，又要在做好小事的基础上培育美好品德。二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着时代精神，能够为广大青年形成和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提供重要引领作用。广大青年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在小事中加强反省与修养，自觉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行为习惯与生活方式。

三、加强知识学习，增强本领锻炼

“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人生理想的树立离不开学习，人的品德塑造也离不开知识，民族事业的蓬勃发

展更离不开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尤其是在信息化、知识经济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更需要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人才。

青年获得真才实学离不开扎实学风和艰苦作风。一要求真务实，孜孜不倦。青年要立足社会现实，想真问题、做真学问，找真答案。学习绝不是表面上的走马观花、不是肤浅的自我满足，而是实实在在地抱着解决问题、扫除困惑的心态把道理搞清楚。同时，学习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要下大功夫、花大力气把知识懂悟透，把学习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二要广泛学习，开阔眼界。在时代的快速发展以及事业要求的不断提高下，青年既要扎实掌握基础知识，又要紧跟时代前沿，及时更新知识；既要钻研专业理论，不断掌握专业技能，又要博览群书，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读无字之书，于社会生活的观察与体验中汲取知识与智慧。三要知道知行合一，躬身实践。青年要广泛地投入实践，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在专业学习上，要重视第二课堂教育，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与现代技术工具了解与模拟真实生产环境，同时积极采用案例式学习、讨论式学习等多种方式吸收理论知识。在专业领域之外，也要广泛参与各类社会实践。青年可以走遍祖国各地，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国情民生；可以参与志愿服务与支教活动，在帮助他人中加强精神力量；可以步入社会劳动创业，增长见识与才干。

四、勇于砥砺奋斗，敢于创新创造

奋斗是彰显青春的底色，创新是张扬青春的力量。奋斗与创新是青年拥有顽强拼搏的青春不可或缺的元素，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至关重要的元素。

一方面，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就个人幸福来说，唯有奋斗才能带来深刻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一劳永逸、吃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汗水开辟人生和事业前程；不是逃避困难，而是有无限的勇气直面问题。贪图安逸与逃避困难只能带来一时的慰藉，唯有培养起不畏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才能获得自由。就伟大事业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斗争中开辟与前进的。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复兴需要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无私奉献、担当奋斗。因此，青年要勇于砥砺奋斗，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履行每一项职责中见精神，勇于到条件艰苦的基层、国家建设的一线、项目攻关的前沿，经受锻炼，增长才干。

另一方面，敢于创新创造的人才才能不断开拓局面，有创造力的社会才能富有生命力。于个人发展而言，因循守旧、满足现状的人容易被社会潮流所落下，难以抓住机会，为社会作出贡献；敢于创新的人往往充满力量、自信自强，勇于闯新路、创伟业，不断开辟事业发展新天地。于社会发展而言，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技术的突破、文化的革新、思维方式的变革等无一不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升人民幸福感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广大青年要肩负起首要的创新责任，抱着探索真知的态度，凭着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意志，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开拓事业新局面。

习近平关于青年成长成才的相关重要论述，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科学内容，又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精华，既融入了习近平自身的实践体悟，又饱含了习近平对青年成长的殷切希望，既为当代青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供思想指南，又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生力量提供战略指导。深入理解习近平关于当代中国青年成长成才的科学内涵，对于培育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道德观的探究

■ 盘 巍

（一）历史逻辑：来源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赋予的历史逻辑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处理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高尚道德。中华传统美德强调个人要“止于至善”，既要肯定自身价值，更要追求“至善”之人格，立志成为圣人君子。同时在物质利益方面，中华传统美德重视“道义”，强调重义轻利，推崇“舍生而取义者也”的义利观。最后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中华传统美德强调要“仁者爱人”，仁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要素，仁爱思想既有爱亲人的“孝悌”，也有对國家社会“先忧后乐”的情怀。正是这些传统美德的支撑使得中华民族创造出无数历史辉煌。

习近平文化思想将这些传统道德理念进行守正创新，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对个人而言，在“至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将传统道德与社会实际相结合，提出新时代道德建设的新要求。对于传统的“道义”，习近平将其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正、法治等理念上，强调维护社会稳定需要遵守的公平正义原则。对仁爱思想进行充实，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注重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些理论的突破创新是习近平道德观的重要组成，为新时代道德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中道德观的意蕴阐述

道德观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核架构，站在“两个结合”的高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要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创造性，立意深远、内涵丰富，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新时代道德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要义，将人民幸福作为道德建设的根本目标

首先，要以人民需求为主线开展道德建设。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道德的建设也应紧跟前进步伐。只有让道德建设围绕人民群众关

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满足人民对道德建设的根本需求，让群众切身感受道德建设带来的好处，才能凝聚起全体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认同感。

其次，要明确人民群众是道德建设的最大动力。人民群众是道德建设的目标指向，同时也是道德建设的深入参与者。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民群众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为孕育道德品质提供了广袤的沃土。同时，人民群众对美好品德的追求也在推动着社会主义道德的不断完善。

最后，要保障人民享受道德建设的成果。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由人民共享，是保障人民根本利益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建设成果的共享，使得人民充分感受社会主义制度的关怀，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人民生活幸福感不断提升，整个社会也会更加和谐融洽。

（二）坚持以中华传统美德为根基的文化底色，以守正创新作为道德建设的根本途径

一方面，新时代道德建设要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精髓。经过历史洗礼而造就的优秀传统美德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根据时代条件，继承和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包含其中的传统美德。”因此，新时代推动道德建设，应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传承传统美德精髓，以此提高中华民族道德水平，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另一方面，新时代道德建设要积极推动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强调道德建设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灵活构建科学转化机制，使中华传统美德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结合，传统道德资源与时代意蕴深度融合，从而揭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实现道德建设的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习近平生态伦理观的双重内核

■ 林志鹏 李慧芳

人，“人类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自然规律。”“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现代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于工业革命以来滑向歧途的人类中心主义。在 2014 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特别提出：“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自然不是与人相对立的客体，自然力量也不是人类可以随意摆布的对象。”与此同时，反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人类合理利益。自然界并非总是和谐，其演化进程中会蕴含破坏性危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立足于合理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推动文明的生态化与生态的文明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生态正义维度：构建权益与责任统一的公平体系

习近平生态伦理观的第二层内核是生态正义。伦理涉及价值判断，而正义是价值的核心部分。生态正义的实质是“以生态环境为介质的人与人之间的权益与责任平衡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统植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其内在矛盾的化解根本上依赖于人际矛盾的调适。因此，践行生态伦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愿景，必然要触及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将生态正义置于核心探讨维度。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量论述都体现了对生态正义的高度重视，涉及种际正义和人际正义，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国内正义和国际正义等多个角度。例如，习近平将良好的生态环境界定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提出“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就清晰阐明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要和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是我国生态环境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这些生态产品的享用，是人民群众共享的生态权益，而不是一部分人的特权。习近平还系统论述了健全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与生态补偿机制，做好跨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和城乡绿化一体化工作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些主张旨在确保生态正义惠及所有区域与群体，特别是发展滞后地区和困难群众，要扭转贫困

与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恶性循环。这与西方绿色发展思潮隐含维护特定阶层利益的诉求、抽象谈论生态正义形成本质分野。

从国际正义层面来看，西方主流绿色思潮常以关切“人类整体命运”为叙事旗帜，却普遍存在对欠发达国家正当发展权诉求的忽视。尤其在涉及国家间历史责任分担、发展空间分配及实质性支持等核心议题时，其主张与实践往往回避结构性不平等，弱化了全球环境治理的公平性根基。习近平提出“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提倡国际社会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体现其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性思考。对于国际生态正义，习近平多次表示要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照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困难。为此，习近平呼吁发达国家承担起历史性责任，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治理上多做表率，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方位支持，帮助其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远早于发展中国家，直至今天依然是世界资源主要消费者和世界废弃物主要排放者，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灾难要负主要责任。反观发展中国家，常常面临由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导致的资源掠夺和环境负担转嫁，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承受巨大代价。若忽视这一结构性现实，全球环境治理就会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展性，导致全球生态正义不正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承担同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地缘性行动，对全球生态安全作出巨大贡献。

生态道德与生态正义构成习近平生态伦理观的双重内核，二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没有生态道德的引领，生态正义可能失去其崇高的价值方向，沦为纯粹的利益算计；没有生态正义的支撑，生态道德则易流于道德说教，难以真正改变不公正的发展模式。习近平生态伦理观的完备架构及其蕴含的深刻洞见，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完整的伦理坐标系，也为人类破解生态危机、实现人与万物的和谐之美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价值研究”（项目编号：GD23XXY12）。

（作者单位：1.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